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

程巍 著

种族主义想象力



漓江出版社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

种族主义想象力

程巍 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 种族主义想象力/程巍著.—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407-6661-0

I. ①泰… II. ①程… III. ①船舶遇难—华人—史料—英国—1912 IV. ①U67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94043 号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 种族主义想象力



出版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制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960 1/16
印张 21
字数 250千字
版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7-6661-0
定价 39.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再也没有像中国佬这样低劣的种族了。

——弗兰克·匹克斯利：《美国国会华人移民问题
联合特别调查委员会报告》(1876)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1926)

序

纽约时间 1912 年 4 月 18 日深夜，历经近四天的海上航行，搭载着 700 多名泰坦尼克号海难生还者的卡帕西亚号终于抵达纽约。蒙蒙细雨下的纽约东河码头上等候着成千上万身份和心情各异的人：亲友、记者、警察、纽约海关人员、联邦政府官员、教会人士、围观者以及一些与泰坦尼克号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英美跨国公司老板。本来，他们是准备带着一种迥然不同的欢快心情在这里迎候泰坦尼克号的到来的，如今到来的只是泰坦尼克号的生还者。

当泰坦尼克号头等舱和二等舱的生还者三三两两走下卡帕西亚号的跳板、穿过警察在码头上拉起的警戒线后，立即就被守候在那里的亲友和记者团团围住。从这一刻起，作为整个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的一部分——不是孤立的一部分，而是与“另一部分”构成某种“种族性对比”的整体的一部分——有关泰坦尼克号上几个“中国佬”的身份及其逃生经历的各种传闻就在码头上传开了，并经由电讯和报纸迅速传播至整个美国以及全世界；而这一刻，被他人不停地谈论的那几个“中国佬”还留在卡帕西亚号的三等舱里，直到次日凌晨，才由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及英国唐纳德轮船公司驻纽约办事处的人员带走。4 月 20 日《纽约时报》登出该报记者于 19 日凌晨在码头采写的一篇题为《中国偷渡客》的报道：

从下沉的泰坦尼克号获救的人中，有6个中国人。他们在泰坦尼克号还未离开英国港口前就偷偷溜进了其中一只救生艇，当该船撞上冰山时，他们并不惊慌失措，他们知道，如果泰坦尼克号有沉船危险，救生艇会放到海面。他们随身都带着女人用的披巾，当他们听到船上有人大喊“女士优先入艇”时，他们就拿披巾把自己遮起来，让船员误认为他们是女人。

黑暗使得他们成功躲过别人的审视。直到他们被救上卡帕西亚号，才知他们是中国人。据说当时卡帕西亚号的一些船员要把他们扔回海里，但其指挥官们不想这么做，而是把他们关进了船上的囚室。至于这些中国佬当初为何未被泰坦尼克号船员及乘客发现，让卡帕西亚号上的人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联邦政府官员将这些被囚禁的中国佬带走，而为遣送他们回国而必需的手续也正在办理中。

除第一句和最末一句（或最末一句的一部分），该报道中其他有关这几个“中国佬”的身份、逃生经历和他们在卡帕西亚号上受到的对待的描述全是杜撰的，尽管杜撰得如此离奇，却立刻就被其他报刊当作事实加以转载和引用。1910年代的美国新闻业太需要这一类能够证明“中国人的种族卑劣性”的“中国佬的故事”来激发美国公众的种族想象了，以支撑美国当时正在实施的种族主义的《排华法案》的合法性。各报刊陆续登出的有关这几个“中国佬”的“卑劣行径”的报道也和《中国偷渡客》一样，大多是种族主义想象的产物，而它们彼此之间的细节冲突性——冲突到同一个人的讲述甚至可以前后矛盾，并没有毁掉它们的可信性。这就需要从“宁可相信”这种心理机制中寻找原因了。实际上，记者们甚至不必费劲地去码头采访那些饶舌的生还者——那些“说英语”的生还者，因为有关“中国佬的故事”或许在他们离开报社或通讯社之前就已按照美国排华主义的既有想象构

思好了，这就像那些从来不曾与同船的“中国佬”谋过面的泰坦尼克号头等舱和二等舱的美英生还乘客向亲友和记者们反复声称自己曾“目睹”这些“中国佬”的“卑劣行径”一样。一个人可以“目睹”根本不曾发生的事，那只说明这些事发生在他的想象中，他是他的幻象的见证人。至于这几个“中国佬”到底是何身份，在海难中又如何逃生，对他们来说既不重要，也不值得关心。反正，这8个“中国佬”中有6个活了下来，仅此就足以证明他们是以一种卑劣的方式活下来的：原因无他，其“种族卑劣性”使然耳。

当人们“宁可相信”这些相互冲突的故事的真实性时，他们就进入了“信仰”领域——所谓“信仰”领域，是一个“价值”或者“意义”领域，而不是“事实”领域，人们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存在而信仰“上帝”，而是感到需要一个“上帝”而为自己创造了这么一个“上帝”。毋宁说这是一种“心理现实主义”，是建构这个世界的景观并赋予它以秩序和意义的一种话语方式——正如他们“宁可相信”船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说美英男子在海难中全都像绅士一样礼让，像骑士一般刚毅，恪守“妇孺优先”的规则而情愿将死亡留给自己；而事实上，在泰坦尼克号海难全部705名生还者中（这还不包括冻死在救生艇里或登上卡帕西亚号后死去的那几个美英男子），男子占了一半，而美英男子又在其中占了一多半，而且他们大多在那几个“中国佬”之前就陆续逃离了泰坦尼克号，并拒绝让自己所乘坐的救生艇返回救人（最终，近20只救生艇中，只有一只返回了沉船现场），尽管绝大多数救生艇还空有座位，其中6只几乎空了一大半座位，足以再容纳三四百人，而被遗弃在沉船上的还有165名妇女和儿童。然而，种族主义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权力意志，它惯于通过“制造事实”来论证自己。与其说先有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的“卑劣行径”才有中国人的“种族卑劣性”，不如说先有中国人的“种族卑劣性”的话语建构才有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的“卑劣行径”。他们的“卑劣行径”发生在排华主义者们的想象中。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流行的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等同于泰坦尼克号海难，或者说从流行的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还原”泰坦尼克号海难，那么我

们就无法对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的“故事性”保持一种充分的警觉。“回忆”之所以常常不可靠，是因为当人们在“追叙历史”时，他们实际上往往是在“发明历史”。

暂且抛开最为核心的经济原因不论（流行的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的特征就是避开经济不谈，以便将海难“罗曼蒂克化”，而经济解释将是本书的一个重点），从心理发生史来看，1912年4月的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深深根植于英美盎格鲁-撒克逊父权制社会的一种现代焦虑，担心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男子“惑于”现代平等思想而失去“男子气概”并因而失去统治的能力（对女性、下层阶级以及“劣等种族”的统治），因此它通过夸张性地想象泰坦尼克号海难中盎格鲁-撒克逊上层社会男子的“古风犹存”的“骑士精神”而阻击对盎格鲁-撒克逊父权制社会形成内外挑战的种种现代平等诉求（诸如男女平权、阶级平等、种族平等）。不过，倘若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主义不为它所定义的“劣等种族”自身所接受，它就永远只是一种单方面的或者说无效的指控。种族主义的假定（如“中国人的劣根性”）要在被它定义的“劣等种族”中实际发生作用，一定要在其跨国传播中获得“劣等种族”内部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那些西化或“英国化”的知识分子的普遍赞同，并通过他们的话语的不断再生产将“中国人的劣根性”内化为本民族看待自我的一种态度以及话语方式。

这些西化或“英国化”的东方知识分子有一个浑名，叫“麦考利的孩子们”。以《英国史》等著作出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男爵1834到1838年间曾任英国印度殖民当局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还是印度《刑法》（该《刑法》在1857年印度“大叛乱”之后被迅速付诸实施）的主要起草者。不过，他对大英帝国的最大贡献，或许莫过于1835年他到达印度的次年所提交的《教育备忘录》，力推殖民当局废除印度本地语教育，将殖民宗主国英国的国语作为印度教学语言和官方语言，理由是“文明”的英语远比“野蛮”的东方语言优越。尽管麦考利对东方语言一窍不通，对本就少得可怜的东方文学英译本也所知有限（当然，就他的文化殖民主义动机而言，也不必去了解），但他断言：“印度和阿拉伯的全部文学加在一起，还比不上欧洲一个较

好图书馆的一层书架的书，而支持这项东方教育计划的东印度委员会的委员们对西方文学的内在优越性心知肚明。”麦考利让印度本地上流社会的子弟们沉浸在古典英语文学中，既疏离于印度语言文化，又疏离于当代问题，以“尽我们所能，在他们中间培养一个在我们与我们所统治的亿万当地人之间充当翻译的阶层，一个具有印度血缘、印度肤色但在趣味、见解、道德和智识上英国化的阶层”^①，他们将被充实到殖民当局的各类机构的下级职员岗位。《刑法》和“英国文学”，这就是麦考利在印度施行的一武一文的殖民统治之道。

三十年后，麦考利的外甥乔治·特里维廉来印度考察教育，他在那里随处都可以见到他的舅舅的教育计划培养出的好几代“麦考利的孩子们”。他惊奇地发现，那里的“青年孟加拉派”或者说“西化派”的学者和学生“从艾迪生和哥德斯密斯那里习得了我们的语言，在一切场合都使用上个世纪的古风盎然的书面英语”，“他们说起话来，就像那些从来就没有读过鲍斯威尔的人所假想的约翰逊博士说话的方式那样说话”，而“这些土著的模仿本能及其取悦他人的欲望永远使人无法知道他们的情感是真是假，事实上，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是谁，都令人大生疑问”^②。这种丧失主体性的“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心理状态，正是“知道自己是谁”的英国殖民主义者通过古典英文教育而期望在印度人身上见到的状态，因为这是一种易被操纵的心理状态。维克托·基尔南就麦考利的东方教育计划的殖民统治目标评论道，在印度，“莎士比亚的影响力无远弗届”，但所有这一切与印度切身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无涉，而这种全然外语（英文）的古典的教育养成的“抽象的心灵与思维”让印度人维持着“心灵与肉体分开”的状态。^③

在印度殖民地施行的麦考利式的“东方教育计划”在1842年之后又改头换面地用在了“半殖民”的中国，以便在中国人中间培养

① Thomas Macauley, "Minute on Education", in H. Sharp, ed., *Selections from Educational Records, Part I (1781-1839)*, Delhi: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 1965, p. 116.

② G. O. Trevelyan, *The Competition Wallah*, London and Cambridge: Macmillan and Co., 1866, p. 51, p. 331.

③ 维克托·基尔南《人类的主人：欧洲帝国时期对其他文化的态度》，陈正国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3页。

“麦考利的孩子们”或者“John Bull”所说的“John Chinaman”。英国商人在华所办中英文报纸以及传教士在华所办教会学校和语言学校都致力于向中国子弟传播英国的“趣味、见解、道德和智识”。《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的作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谈到他这部出版于2003年的著作的写作缘起时，说灵感来自他偶然在一本当初英国出版的英文小册子里看到的一张1901年拍摄于北京菜市口的处决义和团团民的照片：在现场观赏处决场面的除了一些中国人外，还有一些作为北京的征服者的英帝国军人，而在处决现场——与几具已身首异处的团民尸体仅隔数尺——的一面墙上，贴着附近一家英文学堂开设英文课的中文广告。如果说对义和团团民行刑的场面是以肉体惩罚的方式展示“文明”对“野蛮”的“规训”的话，那么，“和行刑的场面并列排在一起，这张广告模模糊糊地表现出另一类教程。这类教程的目标，是教育土著人在一个有着陌生的新权力关系的白人世界里，应该如何行为。它也表明，驻在中国的强大的欧洲帝国军队与那些想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复杂关系。也许还可以从中发掘出其他一些意义，但无论提出什么解释，这个广告本身都通过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具体事物，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①。

这张1901年拍摄于北京菜市口的处决“叛乱”的中国人的照片，令人联想到1905年左右留学日本仙台医专的鲁迅在课间看到的那张日本军人在中国东北处决充当“俄谍”的中国人的幻灯片，而鲁迅从这张幻灯片中的那些中国人身上发现了作为“国民性”标志的精神的“麻木”和“愚弱”，并将其悉数归咎于中国文化，发誓要以文化的“全盘西化”——乃至废灭汉语，改用西式文字——来“改变他们的精神”。不过，当鲁迅使用“国民性”或“民族性”这一类本质主义的概念时，他就把一种“历史”的现象描述成了一种“种族”的固有特征，把一种“历史的表情”当作了一种“种族的表情”，并且完全

^①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页。

忽视了这种“历史的表情”与1842年以来西列强长久的武力凌辱和文化殖民给中国人造成的“精神的瘫痪”有着某种关系。疗治这种“精神瘫痪症”的药方不是“全盘西化”，因为它恰是造成这种“精神瘫痪症”的原因之一，而是在内心不断复活民族（国家）历史上的那些“伟大时刻”和伟大人物的精神，并赋予它们一种现实感。

与武力殖民不同，文化殖民不仅隐蔽，也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缓慢的“分子入侵”过程，尤其是对中国这个当时依然享有半主权的“半殖民地”而言。文化殖民将一种民族自卑感渐渐打入中国人的心理，它利用各种文学形式和后来的影视形式以及对所有这些形式的大量复制，一点一滴地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意识、情感和想象，在其深处培养一种足以瓦解其集体意志的民族自我憎恨，悄悄改变其历史时空认知方式，以最终夺取这个国家的文化领导权，控制其精神。这同时又意味着它难以被察觉，更难以被根除。主权在手——或部分在手——的幻觉（即杜赞奇所说的“殖民控制的间接性”）使中国新派知识分子容易忽视作为国家主权核心部分的教育主权的悄悄易手，乃至在一种政治无意识状态中以变相的方式主动将教育主权拱手相让，即自愿充当西方文化殖民的本土代理人，他们通过毁弃“野蛮的”本土文化来为“文明的”西方文化的进入“清空场地”。此情此景，让1925年归国的新文化运动曾经的斗士而如今转向文化民族主义的刘半农感到忧惧。他在1925年年末的一封信中对周作人所说的“我们已经打破大同的迷信，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耳”大表同情，并在不久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归国后的观感，说自己在国内随处看到钱币、报刊、店铺招牌、路牌上印着外国文字，是“殖民地现象的见端，在有心人看了，正应痛心疾首。而不料另有一部分人要先意承志：人家还没有能把我们看作殖民地上的奴隶，我们先在此地替他作预备功夫，此诚令人凄怆感喟，欲涕无从也”^①。语言文字乃一国之民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核心，淆乱乃至摧灭其语言文字，是瓦解其认同的关键步骤。

^① 刘半农《关于外国话及外国字》，《半农杂文二集》，上海书店出版（据良友文库1935年初版影印），1983年，第136页。

中国的“现代自我”形成于戊戌变法与新文化运动之间，那正是西方的“军事胜利带来〔西方的〕精神胜利”^①的一个“全球传播”的高峰时刻：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家们征用西方现代“科学学说”——诸如博物学、动植物分类学、进化论、文明等级论、人种学、地图绘制学、种族性和民族性理论等等，以便将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全球统治呈现为一个“文明等级”和“社会进化”的层级景观，同时，这一呈现过程伴随着西方对于世界历史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大规模书写，而服膺西方现代“科学学说”及以之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的世界历史写作却不察其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性的中国西化派人物（所谓“启蒙家们”），则不断强化这些“科学学说”和殖民史学在国人心中的至尊地位，以“更新”国人对于历史时空的感知方式。

的确，一方面，中国的“现代自我”大大拓展了世界及其历史的景观的边界和层次，因而一直以来为我们的现代史家们熏香祝福，但另一方面，整体而言，这个“现代自我”呈现出的世界及其历史的景观只是冒“自我”之名的“西方之眼”中的景观，是“麦考利的孩子们”或“John Chinaman”眼中的世界，它重叠于J. M. 布劳特所说的与西方的全球统治互为表里的“西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而它竟构成我们的“现代自我”无意识深处的核心结构，那里供奉着“有关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的一个极为强有力的信仰，即认为欧洲文明——‘西方’——具有某种特别的历史优越性，某种种族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灵的或者精神的优越性，它自古至今一直赋予欧洲民族一种超越其他任何民族的永恒优越性”^②。正因如此，当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并自此成为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领袖之一的胡适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再表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③并在

① 维克托·基尔南《人类的主人：欧洲帝国时期对其他文化的态度》，第11页。

② J. M. Blaut,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3, p. 1.

③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5），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5页。

新一代青年那里获得广泛共鸣时，就并非偶然了，他无非是在重复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国民性批判”——的那些经由不断的话语轰炸而炸入国民集体无意识的顽念而已。像其他西化派人士一样，他把西方的一种权力意志的表达变成了一种客观知识。

这个被我们的现代史家们熏香祝福的“现代自我”恰恰丧失了“自我”，就像特里威廉在印度的“麦考利的孩子们”身上观察到的，它“是否知道自己是谁，都令人大生疑问”。因而，并不奇怪，西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总能在被其定义为“劣等种族”的族群里找到它们最为虔诚的信仰者，以至当今，在“后殖民批评”浪潮中，当它们在其发源地遭到猛烈攻击而被迫处于蛰伏状态时，它们依然可以在被它们所贬低的“劣等种族”那里找到毫无愧色的代言人。无意识的“边缘”拱卫着一个道德溃败的“中心”，以延续这个“中心”对于“边缘”的不道德的统治。P. 巴拉冉 2001 年在《麦考利的孩子们》一文中就印度以及目前世界多数地区的情形指出：“英帝国或许已遁入历史书页之中，但英语依然是一项持久的尽管在某些时候引发争议的遗产。”^① 不过，英帝国还有一项更为隐蔽也更为宏大的遗产，即它在其殖民主义巅峰岁月所建构的并在其跨国传播中被“普世化”的关于世界及其历史书写的盎格鲁-撒克逊中心主义模式，只不过英帝国的衰落和美帝国的崛起，这份遗产完成了一次跨大西洋的“移交”而已。1912 年的泰坦尼克号海难故事书写见证了这种“移交”的开始。

泰坦尼克号海难发生后，作为英国文化殖民主义前哨的英国人在华所办中英文报纸以摘译、摘编英美电讯——多为“想象性报道”——的方式连续数日“同步”报道这场海难，以左右中国人对这场海难的感知方式。假若说英美报纸和电讯有关泰坦尼克号海难的叙事对一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海难中的不光彩行为尚有零星的微词的话，那么，在英国人在华所办的这些中英文报纸上，所有这些“杂质”均被小心剔除，以便将泰坦尼克号海难再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气概”与中国人的“卑劣怯弱”之间的一种意味深长的“种

① P. Balaram, “Macaulay’s Children”, *Current Science*, vol. 81, No. 7, October 10, 2001, p. 733.

族性”对比，而这些“想象性报道”迅速被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的新派教育家和教科书编撰者们编成课文，编入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的高小语文教科书，此后又被编入其他类型的语文教科书，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通过数以百万计的发行量，让一代代中国学童透过西洋镜来看待自己的民族。在30年代，即旷日持久的“国民性批判”已使“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的时刻，有关“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的“卑劣行径”的故事又被中国报刊旧话重提，作为“国民劣根性”的又一铁证——尽管这份“铁证”只是美国种族主义—排华主义的想象的产物。具有反讽意义的是，这些西化派人物一方面强烈要求美国废除其种族主义的《排华法案》，一方面又以美国的种族主义（“中国人的劣根性”）来强化美国《排华法案》的合法性基础，因为这个基础恰恰是“种族性”理论。就中国“现代自我”的感知方式的形成史而言，“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话语片段，一个微小的话语事件，但它既是这种渗透一切的感知方式的一个产物，同时又强化了这种渗透一切的感知方式。“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因被归于“大众文化”而很少被“严肃”的历史学家所关注，不过，在塑造大众的历史感知上，在塑造“种族性”或“民族性”上，“大众文化”远比那些或多或少带些复杂理论表述的“学说”更为有效，它正是各种未经反思的智慧检验的“陈词滥调”寄生的场所，而这些“陈词滥调”被分门别类地用来自动地对付每一句质询：一说到“英国人”，就是“绅士”，一说到“法国人”，就是“浪漫”，等等。十五岁左右刻下的套语到五十岁时还照样使用。

就“半殖民”状态下中国西化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殖民缺乏警觉意识乃至形成不了一套反抗话语，《现代的诱惑》一书的作者史书美写道：“由于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已经亲自动手系统地废黜了中国的本土文化，因此，人们无从获得用来对抗殖民主义的无瑕疵的和未受搅扰的本土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半殖民主义的语境使得对反抗的清晰表达成了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本土文化已然被‘解构’，再不能被当成是一种公认的对抗手段，即使对那些提出本土文化复兴的人来说也不例外。由于偏离了二元的殖民模式，半殖民语境下殖民关系的清晰性

被削弱了。”^①一方面，殖民关系的清晰性被削弱，钝化了西化派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殖民的政治敏感性，将这些与西方殖民统治息息相关的西方学说作为“启蒙思想”的无私馈赠；另一方面，由于千百年来一直作为本民族共同体（国家）的认同基础的本土文化传统遭到系统瓦解，因此，即便一种后觉的反殖民意识对渗透在中国“现代自我”中的西方文化殖民主义进行了大清扫，它可能也无力为整个国家提供一种深根厚植的身份认同：它发现自己空空荡荡地站在两大堆历史碎片之间，而不是安居在一个对它来说充满生动意蕴的价值体系里。

这个“现代自我”中所积蕴的民族自卑感及其散发的强大离心力正日益掏空作为这个千年之国的立国根基的文化认同，并造成虚无主义及作为其在道德层面的显现的伪善的流行。此时，一种长时段的“全球史”的视野尤其显得必要和迫在眉睫，它或许能摧毁我们的“现代自我”的意识和无意识深处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核心结构，从而洞开一个全新的世界及其历史景观，为一个更加公正而且更多相互尊重的世界作出贡献。换言之，必须一次次实现历史时空的“穿越”，返回中国“现代自我”形成史上的那些“关键时刻”，考查其知识谱系的形成及其传播方式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从而在形成史的源头处扭转这种渐渐自蔽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我文化殖民倾向。

^① 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第44页。

目 录

序	1
种族主义想象力	1
历史密码	34
为“中国佬”作证	45
泰坦尼克号/巴别塔	49
阶级区隔的重建	60
来自香港的司炉工	83
操纵海难故事	88
“不存在阶级差别”	124
种族主义的色谱	145
西方规则/中国规则	175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	207
官方调查	243
最后时刻	258
“又一国耻”	268
附录	310
后记	313

种族主义想象力

《随老木舟而沉：泰坦尼克号海难的文化史》的作者斯蒂文·毕尔提请他的读者注意泰坦尼克号开始其处女航——亦是死亡之旅——的1912年4月是一个各种社会冲突同时上演的复杂时刻，而这个“文化的时刻”犹如一张若深若浅的描红纸，已事先划定泰坦尼克号海难故事写作的基本框架：

1912年4月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暴力、动荡和不定的时刻，是一个“种族问题”、“妇女问题”、“劳工问题”和“移民问题”引起严重担忧的时刻。泰坦尼克号是在一个文化的时刻沉没的，而不是在真空中沉没的——那不是孤立的时刻，而是一个充满各种回声、意义、关系和联想的时刻。对美国人来说，他们不可避免地他们自身当时的文化来思考和感受这场海难。^①

毕尔是哈佛的美国文化史专家，其专业兴趣所在及兴趣所引导的史料选择范围使他更多地关注“美国问题”或者说泰坦尼克号海难故

^① Steven Biel, *Down with the Old Cano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Titanic Disaster*,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p. 10.